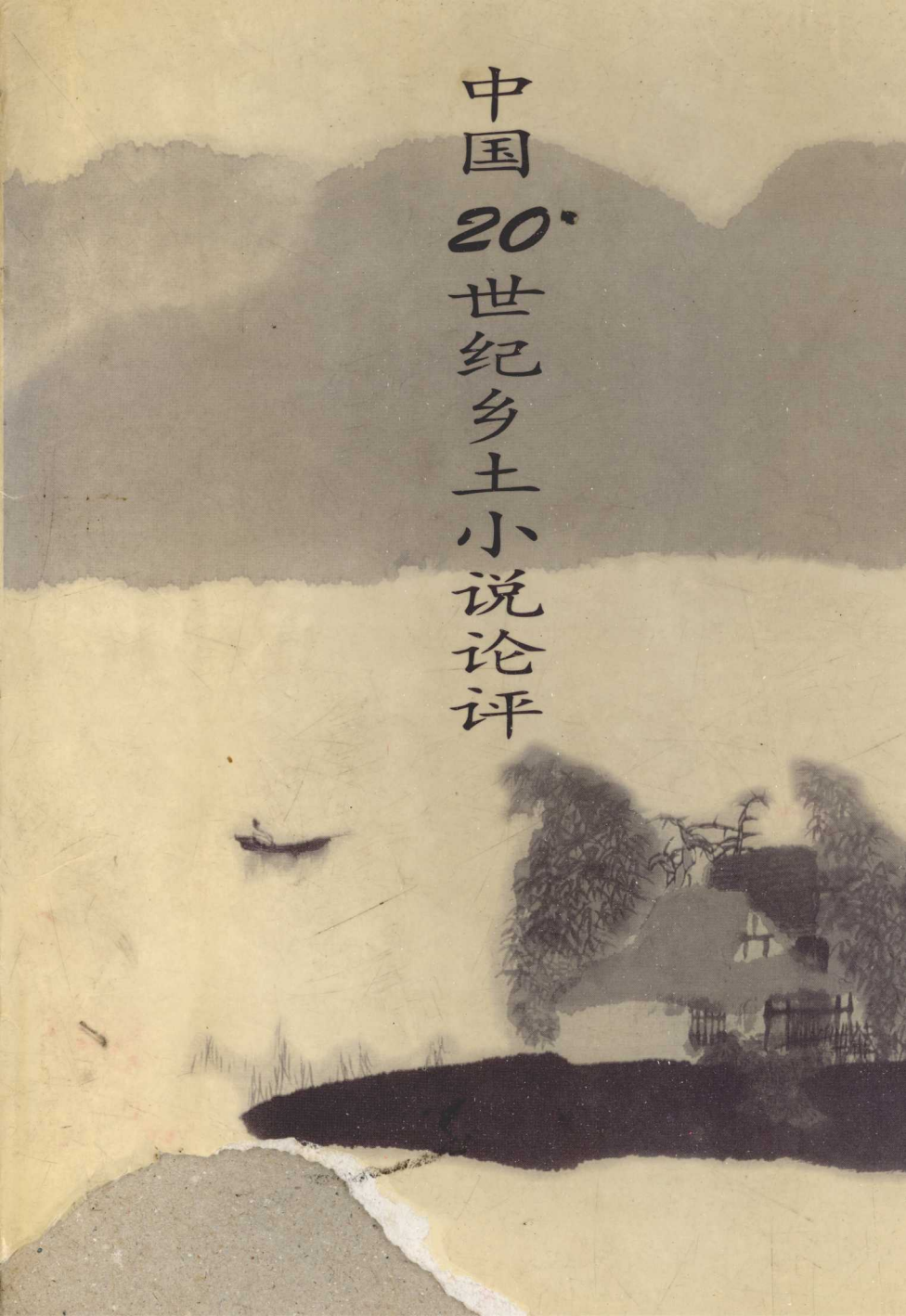


中国
20^{世纪}
乡土
小说
论
评



中国 20 世纪乡土小说论评

庄汉新 邵明波 主编

学苑出版社

主 编 庄汉新 邵明波
撰稿人 庄汉新 邵明波 陈 辽 艾 斐 孙厚兴
葛乃榛 王作峰 于为苍 孙宝禄 李守专
董 德 董 峰 蔡 健 史支焱 谢 川
张高山 董 玲 董士雪 李 敬 庄 蕾
李金彩 王洪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二十世纪乡土小说论评/庄汉新,邵明波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10
ISBN7-5077-1313-X

I.中… II.①庄… ②邵… III.乡土文学—小说—文学
评论—中国 IV.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186 号

学苑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广内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24.25 印张 618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定价:32.00 元

魂系乡土

——中国 20 世纪乡土小说史纲

庄汉新

今天，我们站在 20 世纪的末叶上，追溯近百年来中国乡土小说发生、发展的历程，不禁思绪万千，回味无穷。此一世纪，在中华民族绵长悠远的历史中，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新纪元，起死回生的新开端；此一世纪的乡土小说，在中国古老丰富的文学长河里，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新创造，光怪陆离的新篇章。自魏晋南北朝时代发源，明清两代达到峰巅的中国古典小说，自此有了新流向，新突破，新品格。乡土小说，因 20 世纪中国的现代历史所发生，随 20 世纪中国的现代历史所发展，在 20 世纪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现在，我们主编这部《中国 20 世纪乡土小说论评》，意在把这份辉煌和灿烂呈给读者，呈给历史，呈给后人；意在展示一个世纪来，中国乡土小说斑斓多姿，异彩纷呈的全貌，千回百转，惊涛拍岸的流变，并同时理清诸派各家纵横交错的脉络；也意在品评、赏析大师宿将、名家新秀的佳作，传达、揭示出其中的微言、妙意和真美来，以期给后人留下一个更加准确、鲜明和深刻的印象。

在乡土小说这面旗帜下，本书汇集了一个世纪来，85 位作家的 116 篇（部）作品。我们选编的原则，简言之，就是在精的前提下求全；重点考虑的是作家作品的社会反响，思想艺术风格的独创性、代表性，及在乡土小说发展历史中的突破性、阶段性。为了避免概念的含混和理解上的歧义，在何谓“乡土小说”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尚必须先行界定，先行正名。

“乡土小说”这个概念，至今在我国理论与创作界，尚无确定的内涵。30 年代初，鲁迅曾依据当时蹇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

文学研究会一批青年作家创作的某些特点，首次把他们发表在 20 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作品，称之为“乡土文学的作家”、“乡土文学的作品”（见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即是“乡土文学”概念最初的由来。虽说鲁迅在上述评论中没有为“乡土文学”做出一个严格的界说，但是归纳起来，鲁迅当时所谓“乡土文学”，有着两个方面的特定内涵：一是，“乡土文学的作家”，多是“侨寓京城”，远离乡土，先前有着乡土农村生活经历的赤子。他们怀着对记忆中的乡土的依恋，不断做着遥远而深沉的故乡梦。所以，他们的作品多展现故乡的生活，风土和人情，笼罩着一层浓淡相宜的怀旧的乡愁。或者可以说，他们是怀揣一颗乡心话旧土。诚如鲁迅在评述蹇先艾《水葬》时所说的，这篇作品“展示了‘老远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见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或者可以更进一步明确地说，鲁迅所谓“乡土文学”，即是指上述这类作家笔下所描写和反映的乡土农村生活。二是，“乡土文学的作家”在艺术的整体面貌上，带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地方色彩。他们各自藉此建立和显示自己不同凡响的风格，并以这种风格的一贯性和鲜明性，独步称雄于文坛。这即是说，某一“乡土文学的作家”，一定要带有某一地方乡土的风貌，舍此便不成其为“乡土文学的作家”。或者也可以更进一步明确地说，“乡土文学的作家”最终是靠其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地方色彩而得名的，就像鲁迅所论之蹇先艾，他以朴素严谨的笔触；再现了鲜为人知的贵州山区劳动者的悲苦和压迫者的凶残，饶有山城地方特色。蹇先艾因此而享有“贵州乡土作家”的美誉。

而我们在这部《中国 20 世纪乡土小说论评》中，所谓“乡土小说”，是在上述鲁迅“乡土文学”两方面内涵基础上的一种延展和泛化。在不改变鲁迅上述原则精神的前提下，我们所谓“乡土小说”的涵盖更加深广，更加普遍，更加具有囊括力和包容量。我们从鲁迅所框定的蹇先艾、王鲁彦等“乡土文学的作家”的单一门户里走出来，把所有出现农民形象，带着农村乡土题材内容和

地方乡土风格特色的小说作品，都称之为“乡土小说”。按着这样一个界定，自鲁迅以来历经6代的20世纪小说作家，其绝大多数都归入了“乡土小说”作家的行列。这样一个长如龙蛇阵般的队伍，从“五四”起首，一直排到眼前，大有千军万马，绵延不绝，浩浩荡荡之势。由此，我们可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乡土小说作家竟是整个中国20世纪小说作家中一支实力雄厚、阵容强大、人多势众的生力军、主力军。他们在数量、质量、知名度和影响力诸方面，竟占了整个20世纪小说作家的大半以上。他们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名篇佳作，竟成为了20世纪整个小说发展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整个小说世界的基本面貌，甚至在整个20世纪文学的家族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20世纪整个小说世界的作家，大多都把艺术的目光投向农村乡土，大多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和反映了农村乡土。他们的全部生活历程和创作实践活动都大多与农村乡土血肉相连，息息相关。

中国源远流长的小说历史，演进到了20世纪，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特的创作现象？对20世纪乡土小说发生、发展的缘由，从理论上，又该做何解释？

这是一个与20世纪全部复杂社会机制，文化机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大课题。至今，尚未见有人对这个大课题做出应有的回答。我们，作为涉足了这个领域和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学者，尝试着把我们的思考和浅见，付诸笔端，以正教于方家。

1. 这种十分奇特的创作现象，是20世纪自初叶以来，一连串政治革命的结果。20世纪，中国历史由古代、近代进入了她的现代阶段。较之此前缓慢发展的中国历史，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高潮迭起，接二连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4年以后爆发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随后开始并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革命的大潮排山倒海，日甚一日地冲击着现代中国这块偌大的乡土。而从现代革命开始的那天起，历次革命所环绕并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都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

解决得好与坏，都在事实上成了检验中国现代任何一次革命成功或失败的试金石。“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中国现代革命的领袖人物毛泽东这句为大家所熟知的話，倒是十分簡括地道出了中国现代革命的一个鮮明特征。因此，早在本世紀 10、20 年代，当现代革命尚处于酝酿、准备期的时候，她的先驱者和志士仁人就清醒地认识到唤起民众，尤其是唤起农民群众的重要性，就敏感地把唤起农民群众、发动农民群众，当作革命的第一要素。鲁迅在早年发起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及在“五四”《呐喊》中所表现出来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在本质上都是“揭出（农民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都是通过暴露农民的不幸，提出发动农民群众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对未来革命成败的利害性。这样，鲁迅最早的一批乡土小说，就是直接顺应革命唤起农民群众的需要而产生。换言之，现代革命唤起农民群众的直接需要，促成了鲁迅第一批乡土小说的产生。鲁迅，也就自然成了本世纪初叶，用乡土小说唤起农民群众的第一人。他公开地亮出“遵命文学”的旗帜，更充分地显示了他的文学作品与中国现代革命之间的相生依存关系。到了本世紀 30、40 年代，当现代革命已经发展到组织农民群众，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阶段时，乡土小说又伴随着如火如荼的革命而壮大。作为革命的重要一翼或第二战线，在整个革命中发挥了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乡土小说是伴随着现代革命的进程而成长。至于到了本世紀 50、6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的深入开展，乡土小说又自觉地以反映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和巨变为己任，充当着歌颂革命现实、服务于革命现实的正面角色。最终，还是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决定和造就了 50、60 年代乡土小说的这一面貌。而进入 80、90 年代以来，表面上看来，似乎乡土小说新潮淡化了革命政治对它的影响，而实际上，它却是新的革命政治观念取代了原有“左”的革命政治观念的一种表现。其中，一个令人信服的基本事实，是这些新潮乡土小说对原有“左”的革命政治观念的超越、批判与整个新时期全社会对过去“左”的错

误路线的反思、审视是相辅相成的，是这种新时期社会时风影响下的结果。没有一个这样新的社会政治大环境，就不可能有这类新的乡土小说。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一个世纪来，旨在唤起农民群众、组织农民群众、改造农民群众的现代革命，直接促成了20世纪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无论是长处还是缺点，20世纪的乡土小说都深深地打上了20世纪现代革命的印记或带有着20世纪现代革命的痕迹。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没有20世纪的中国现代革命，就没有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

2. 这种十分奇特的创作现象，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直接成果。“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成功及胜利成果的不断巩固、扩大，创造了一个世纪的新文学，使一个世纪的乡土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和多产的新气象。若饮水思源，我们当高度推崇和评价陈独秀在倡导新文化革命运动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于1917年2月发表开天辟地的《文学革命论》，第一个“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响亮提出了彻底反抗封建主义文学的“三大主义”口号，明确宣称：“曰推倒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此番激进言论，可谓敢为天下先，破天荒第一个开拓了文学革命的新纪元。他的“三大主义”，像导火线，随之在文学界引发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具有两千余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自始而风气大变，面目全非。其中，最带有标帜性的历史变革，是内容上的平民化，语言上的白话文。自此以后的新文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就是开始用“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来写实平民生活，尤其是写实处于社会最底层占中国平民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生活。芸芸众生，黎民百姓，第一次取代了原来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开始走向了文学的庙堂，成为了小说的主人公。于是，从此以后，平民文学的呼声才随之大倡，而乡土小说流派才有了开始。这是鲁迅、叶圣陶等第一批乡土小说得以出现的内在根据和历史契机。如果说，陈独秀是从理

论上倡导“国民文学”（即平民文学）的第一人，那么，鲁迅、叶圣陶等则是创作上的“平民文学”的最初尝试者，乡土小说的最初实践者，拓荒者。他们是以丰硕的创作实绩，呼应着陈独秀的理论主张；以首批乡土小说的突出成果，显示着平民文学的勃勃生机和灿烂前景。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除旧布新的特定历史机遇，而机遇也以一种强大的反动力把他们推到了平民文学、乡土小说的最前列。由此造就了他们的声名，奠定了他们的地位，凸现了他们的价值。鲁迅、叶圣陶等的崛起，于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化革命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十分奇特的双向对应。

3. 这种十分奇特的创作现象，是整个泱泱农业大国，漫漫农业文明在作家生活和心理上长期积淀的产物，也是中国罩上鲜明农民色彩的广大人民热烈审美期待和需求的结果。这二者牢不可破，互为因果的供求关系，促进了20世纪乡土小说的新生，使20世纪乡土小说的市场行情看好，前景广阔，呈现出永不萧条、历久不衰的发展态势。从供的方面来说，在我们作家头脑精神的加工厂里，乡土小说一直有着十分巨大的潜在生产能力。这是中国的精神界、文化界，值得引为自豪的宝贵财富和资本之一。中国的作家，大多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和极其深厚的乡土精神素养。乡土化的丰采，成为中国作家内在精神底里的显著特征和风范。无论后来走到哪里，无论后来身份、地位和生活发生何种变化，他们却始终魂系乡土，他们在心灵深处都无法割舍与乡土乡亲的天然联系，都无法磨灭那纯朴真挚的农村生活记忆。而且，惟其因为眼下已远离乡土，那记忆和梦幻中的乡土乡亲，才变得更加深沉，更加真切，更加亲昵，更加富于如醉如痴的神往境界。早年大量农村生活素材的淤积，和眼下发乎内心的眷念乡土的如缕深情，这两方面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作家强烈的表现欲和创作冲动。自“五四”之初，到30年代的国统区作家，无论是像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这类有着庄严的使命感和理性精神的作家，还是像艾芜、沈从文等一类思想倾向不鲜明，专事以

猎奇边城风情和野性而见长的作家，他们都是在这种强烈的表现欲和创作冲动的驱使下，才写出震聋发聩或扑朔迷离的乡土小说的力作。至于 40 年代以后解放区和 50 年代至今，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他们本来都是乡土赤子，后来又在乡村劳动和工作，可谓生于斯、长于斯、劳于斯，乡土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基本内容。当他们操笔为文时，生活的惯性和思想的定势，自然也要顺理成章地沿着乡土运动和演进。他们对乡土题材感兴趣，或者说一生的创作活动始终与乡土结下不解之缘，是不言而喻的事。他们靠乡土安身立命，靠乡土显现特点、价值和优势。他们要想在强者如林的作家殿堂里争得一席之地，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何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往往把乡土小说的创作作为一项工作任务去完成。乡土小说于他们，不仅是人生的事业，而且是对社会的贡献。这都说明，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 20 世纪乡土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都是异常高涨。这是中国 20 世纪乡土小说得以长足发展和繁荣兴盛的内因。若再从求的方面来说，中国农业文明的社会氛围和人民的审美心理，为乡土小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适宜的生长环境。乡土小说的根深叶茂，显然与中国社会的激励和人民的偏爱有着直接的关系，是社会和人民共同栽培和扶持的结果。中国素来是农业大国，以农为本，无农不稳，这是历来既定的国策。这农，不仅表现在生产经济领域，使中国的经济带有农业生产经济的特点，而且还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带有农业政治和文化的特点，因此，乡土小说是农业政治和文化的生动体现和形象说明。它既是这种农业政治和文化的产物，又反过来服从服务于这种农业的政治和文化。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使中国的农业政治和文化对乡土小说特别青睐。一个世纪来，每一次乡土小说高潮的掀起，都是根源于当时中国的农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受当时中国的农业政治和文化的推动与激励。中国农业政治和文化的推波助澜，每每把乡土小说推向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峰巅，使之成为了一个时代文学的骄子或宠儿。我们在回顾 20 世纪乡土小

说的繁荣时，不可不看到这个磁石般的社会驱动力。而对乡土小说的读者来说，这种农业政治和文化的社会氛围也相应作用于他们的审美心理，使他们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对乡土小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其中，无疑有对农业政治和文化观念的接受、认同，又有人物思想和命运的交流、共鸣，又有田园乡情、野老天荒大自然的诱惑，陶冶。中国老百姓对乡土小说的渴求、希望和期待，在审美心理层次上是极其复杂和丰富的。农民，从对象化的审美心理出发，希望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真容，找到自己的影子；城市有闲阶层，从调剂生活、换换口味的实用观出发，以期在乡下人的粗俗、憨厚和丑陋中找到刺激，寻求开心一刻；失意的人们，期盼在超尘出世的山水田园之乐中，排遣现实社会人生的苦闷，乐得个精神栖息的干净去处；有识之士或志士仁人，总想借助作品中农民的贫穷，落后和不幸，引发些社会革命的深层思考，谋求些疗救农民于水火的方略。真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在这说不尽的乡土愁，诉不完的乡土苦，叹不止的乡土人中，竟寄托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这般多的感受和希冀，乡土小说于人们真是千丝万缕，魂牵梦绕，“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和情趣在心头了。人们对乡土小说一直有着这多热望，乡土小说又何愁不发展，不振兴，不走俏呢？

回答了乡土小说在中国 20 世纪出现的历史根据和必然性之后，紧随而来的问题是，百年来的中国乡土小说经历了一种怎样的流变过程，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发展脉络。这问题要求我们必须清晰地表述百年来中国乡土小说运动的轨迹，梳理百年来中国乡土小说演化的历史纲要，勾勒百年来中国乡土小说的面貌，轮廓。

百年来的中国乡土小说，在其自身成长的道路上，呈现出完整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在其链状历史的绵长线索上，每个阶段都以特有的承上启下的特点发挥其作用，显现其价值。

总体看来，百年来的中国乡土小说，可划分为 6 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贯的阶段。

1. 随着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起，鲁迅以第一

批乡土题材的小说，成为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祖师。其意义，不仅为 20 世纪的乡土小说，而且为整个 20 世纪的新小说，做出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卓越贡献。鲁迅这一带有开创性的伟大历史功绩，当不容低估。他的这种小说的出现，历史性地宣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终结，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始。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上，他实际上开拓了一个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新历史，新纪元。鲁迅在“五四”时期推出的首批乡土小说，有两个方面值得人们高度重视。一是他把这时期的乡土小说，看作是自己推行“改造国民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作是自己向黑暗顽固社会堡垒实施反抗和斗争的一把利剑，带有鲜明的政治革命企图。他曾经明确地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便没有人想在这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见《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正是基于这一强烈的政治革命意识，他才那么迅速而集中地连续推出《孔乙己》、《药》、《阿 Q 正传》、《故乡》、《风波》、《祝福》、《离婚》等 7 篇乡土题材的小说。这批小说，在数量上就占了整个“五四”《呐喊》集作品的大半，足以显示其份量的厚重，也表现了鲁迅对农民生活及命运的极大关注，和呼吁社会革命重视农民问题的热忱。二是他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集中揭露了封建主义余孽的罪恶，反映了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两重压迫下，农民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面貌，展现了农民生存状况，婚姻状况，精神状况，命运状况的不幸，悲哀和痛苦。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庄严的使命感，力透纸背，从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在“五四”之初，那个时代，就对农民问题，做出了那么惊人、深切而独到的思考。改变农村的社会环境和农民的生活境遇、精神面貌，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这个带有迫切性的时代课题，被鲁迅第一个大声疾呼地响亮提出来了。如果从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实行的发动农民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方略来看，鲁迅在“五四”之初的一批乡土题材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思考，显然更具有先见之明。

2. 在鲁迅“五四”之初的第一批乡土题材小说的积极影响下, 20 年代中后期, 文学研究会中及受其影响的一批青年作家王鲁彦、许杰、王任叔、彭家煌及蹇先艾、台静农、冯文炳等其他作家, 竞相发表了一批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 形成了风行一时的“乡土文学”热潮。鲁迅曾就其作品的特点, 第一次把他们界定为“乡土文学的作家”。这是 20 世纪乡土文学的历史上, 第一次亮出“乡土文学”的招牌, 打出“乡土文学”的旗号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家, 从探讨人生的要义, 追求生活的真理这个原点出发, 逐步地把眼光转向生活实际, 关心最下层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 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再现乡村农民的真容, 带有浓郁的泥滋味和土气息。从渊源上说, 这是对鲁迅“五四”之初第一批乡土题材小说作品, 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继承, 也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艺术”创作倾向的一种延续。他们的意义在于为沟通鲁迅“五四”之初第一批乡土题材小说与 30 年代蔚成风气的乡土小说现象之间的联系, 架起了一座桥梁, 起到了中介和接力棒的作用。虽然他们事实上名声和成就不及“五四”之初鲁迅、叶绍钧等乡土题材的小说作家, 但是他们仍然不失为 20 世纪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 仍然在 20 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占一定地位。因为毕竟自他们始, “乡土文学”及相应的乡土小说, 才正式有了定名。因为毕竟是经过他们的衔接和过渡, 30 年代的乡土小说才风起云涌, 掀起高潮, 走向繁荣。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 他们在 20 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历史上, 功不可没。

3. 进入 30 年代后, 乡土小说大有蓬勃兴旺之势, 作家之众, 作品之多, 可谓盛况空前。经过“五四”以来, 10 余年的蕴蓄和积累, 乡土小说至此终成蜂起。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 以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时日为界, 分为前后两个层次。

在前一个层次中, 先后出现 3 个引人注目的创作流派。一个是叶圣陶、茅盾二君, 他们原来“为人生”的艺术观念, 至此集中表现为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黑暗腐败统治而带来的农村经济彻底破产社会弊端的揭露, 具有社会伦理学, 政治经济学

以资参照的意义。他们以审视的目光和缜密的思考，对中国畸形农村经济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剖，使他们的字里行间，闪烁着强烈的理性光芒。叶绍钧反映丰收成灾农村悲剧的《多收了三五斗》，以一种朴实、冷峻、自然的风格，致力于描摹、再现生活本身的探索，往往把自己对农村社会经济深刻的见解“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见《叶圣陶选集·自序》），收到了特出的效果。茅盾也终于耐不住寂寞，以他高质量、高水平的著名“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与叶绍钧遥相呼应。将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所导致的农村经济的崩溃流注笔端，尖锐抨击了“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的荒唐社会现实，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其作品高人一筹，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提出了如何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历史课题，通过新一代农民阿多和老一代农民老通宝的冲突、觉醒及反抗、斗争，展现了中国农民未来的出路和前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不可逆转的革命大趋势，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着深刻的暗示。第二个流派是叶紫、萧军、萧红。3位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新人，都不约而同地描写和反映了不堪忍受黑暗社会重压，狂怒起来抗争的农民和风云咆哮激荡的乡土。在他们笔下，乡土不再仅仅是血泪的流淌，痛苦的呻吟，绝望的叹息，而是席卷着风雷，呼啸着呐喊，燃烧着烈焰。乡土小说一改深沉哀婉的格调，而有了激昂慷慨的新声。叶紫的《丰收》、《火》、《电网外》等5篇取材于湖南农村生活和斗争的小说，燃烧着作家“对于客观现实的愤怒的火焰”（见叶紫《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在革命大时代的急风暴雨中，第一次成功塑造了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投入革命斗争洪流的农民新人形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鲁迅曾盛赞叶紫，说他的作品在《文学新地》上发表后，“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而且很快“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见《丰收集·序》）。萧军193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写了东北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在错综复杂，十分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与敌伪军队、汉奸地主之间所展开的殊死搏斗，从而鲜明揭示了“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

即毁灭”的时代新主题，在民族危亡日益紧迫，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新形势下，“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致失去的茂草、高粱、蝥蛄、蚊子、搅成一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见鲁迅《田军做〈八月的乡村〉·序》）。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真切地反映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勾勒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见鲁迅《〈生死场〉·序》）。作家借作品人物的口所喊出的“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时代最强音，撼天地，泣鬼神。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了一种万难不屈，振奋勃发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标志着乡土小说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发展，新突进。第三个流派是艾芜、沈从文。这两位作家，都以精心涂抹西南边境，边城的野性风土和人情，在乡土小说作家群中，别开生面，异军突起，令人称道。所谓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最鲜明、最动人、最酣畅淋漓的展示。艾芜首部短篇小说集《南行记》里的名篇《山峡中》，在夜色凄厉的阴沉背景上，出现了一群被黑暗社会抛出常人生活轨道的流浪汉和盗马贼，对一般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天地和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物。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铤而走险。他们那种带有冒险性和刺激性的畸型生活，使人们一新耳目，大为惊诧和震撼。他们在丑陋的行为中又不乏美的闪光，在看似变态的情欲中又不无纯真、善良的人性。社会使他们变恶，但人性朴实固有的本质又使他们变好。盗马贼小黑牛，年轻姑娘野猫子，倒是真实，完整体现了复杂人善与恶相反相成的两面。这是一出发生在绮丽的西南边陲上的人间悲喜剧。人们从中领略的不仅是异域风光的鲜美，而且还有漫漫漂泊道上，那拼死求生的一群经历的传奇，精神的怪诞。人们的审美视野，相应得到了扩大和延展。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与艾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的特色在于其作品带有湘黔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风物人情。他更多地受到“五四”时代回忆故土的“乡土文学”启发，尤其是受到郁达夫、废

名作品表现手法的深重影响。在野性僻远边城的自然景致中，写了男女主人公情欲的冲动、变态和发泄。人物纯朴原始的天性，和充满灵气的壮阔山水田园相得益彰，把他的一幅幅乡土风情画装点得尤其气韵生动，活脱撩人。《旅店》、《夜》、《还乡》、《边城》、《阿黑小史》、《柏子》、《箫箫》、《丈夫》，他这种接踵而来，活跃高产的创作态势，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他一连串有美感、性感诱惑力的名篇佳作，着实把一代读者的情绪，欲望都充分撩拨，发动起来了。他因此而名声大振，成为了继鲁迅之后又一位乡土小说的巨将。

在后一个层次中，主要出现了姚雪垠、师陀和沙汀三位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这时的乡土小说总的来看，不如上一个层次活跃、多产、红火，没有出现名家云集，读者雀跃的新局面。但是，这三位作家却也以各自不同的主题趋向和创作风格，赢得了读者的厚爱。姚雪垠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因成功地运用方言口语反映农民的觉醒、反抗、斗争而名世。他的著名乡土短篇《差半车麦秸》，最早塑造了一个农民游击队员的生动形象。这篇作品内容的突破在于，它首次反映了一个带有落后意识、习性而又苦大仇深的农民投身革命队伍后的成长过程。第一次揭示了社会革命，对一个农民来说，既意味着要革阶级、民族敌人的命，同时又包含着不断革除掉自己头脑中的不良思想和身上的落后习气，这双重完整的主题内涵。此番新意，开创了农民争取民族解放，阶级解放，自身解放的全部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先河，形象地展示了农民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同步并举的必由之路。他在另一个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里，沿着同样的思路创造，完整表现了一个农民在革命抗日战争中先后的思想变化，明确宣称这部作品“决不仅止于刻画性格，它的主题是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渐渐转移，伟大的同志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见姚雪垠《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它》）由此把描写新一代农民反抗的乡土小说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师陀在此间发表的《寒食节》、《无望村的馆主》等乡土小说，则意在暴露河

南故乡“绅士和老爷”的专横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苦难。其独树一帜的地方，在于临摹社会世象，习俗和人物极见功力，在于采取揶揄的笔调，追求其悲叹和戏谑的融合。在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关心和同情，及对上层大人物的蔑视和讥讽中，含蓄地流露了作家对黑暗现实的深层的愤慨和诅咒。沙汀 40 年代之初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淘金记》，则展现了乡土小说的另一种风貌。这部作品以四川农村的土豪劣绅为主要描写对象，围绕开采烧箕背金矿而引起的内讧，这个中心事件，传神勾画了性格各异的地主阶级的百丑图。他笔下白酱丹和龙哥的形象，可谓是地主和乡绅的二绝。其虚伪，凶残，无耻和丑恶，使人领略了这伙丑类罪恶嘴脸之一斑。同时，这部作品在剖析各阶层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和展示黑暗社会错综复杂的现实人际关系上，也相当成功，十分出色，足以显示沙汀生活积累之丰富，生活功底之厚实，生活接触面之广泛。再加上，地道川人讲出的方言土语，更增加了这部作品浓郁的乡土氛围，使这部作品成为一幅绝妙的川乡社会风俗画。沙汀以这样的面目，开拓了乡土小说的新境界。

4. 1942 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开辟了解放区乡土小说的新天地。赵树理的崛起，及随后丁玲、周立波、孙犁的出现，实现了对鲁迅以来，“国统区”乡土小说的历史性的突破和超越。在 20 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历史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乡土小说，自始有了新的气象，新的人物，新的主题和新的格局。在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乡土小说作家的笔下，男女农民不再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不再是受欺压而无力反抗和自主的奴隶。他们的生活不再为痛苦的血泪所浸泡。他们的命运不再像牛马一样任人宰割。他们破天荒第一次站了起来，成了生活的主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组织了起来，投身于改造社会，解放自己的伟大革命斗争洪流。他们试图用劳动的双手、创造一个新世纪。他们也试图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去谋求自己的幸福，掌握自己的命运。为此，他们焕发出热情，表现出干劲，显示出狂热忘我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显然，这是一些革命胜